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石破天惊来临时

——外国人眼中的“西安事变”

报告文学

石破天惊来临时

——外国人眼中的“西安事变”

李 辉

石破天惊来临时

——外国人眼中的“西安事变”

李 辉*

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或者走在华清池，就是走在历史中。眼前的许多景物都会引发人的感慨。我总觉得，20 世纪，在很大程度上，1936 年 12 月在这里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才称得上具有真正转折意义的历史环节。

那真是石破天惊的时刻，历史道路在这里改变走向。“西安事变”，应该说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刻骨铭心的时刻。虽然各自的滋味各不相同。

对于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中一些人非常幸运

* 李辉，1956 年生，湖北随州市人。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著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秋白茫茫》等。本文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5 期。

地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甚至扮演了比任何人都要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直接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中国 20 世纪的这一历史转折，更是他们刻骨铭心的。

二

斯诺和海伦夫妇，又一次生正逢时，率先走进了这一事件的序幕，听到了渐次响起的前奏曲。

斯诺 1936 年 6 月从北京来到西安，然后从这里前往红军控制的“匪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他抵达西安后，访问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和由蒋介石派来监督“剿匪”、担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斯诺与邵力子曾有过接触。6 年前，在南京，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邵力子，帮助斯诺安排采访了蒋介石。如今，他们在西安重逢，谈论的话题正是在陕北的故事。从他那里斯诺证实了北京的熟人通知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经暂时停止。

邵力子对斯诺说：“不，现在陕北没有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使斯诺相信有可能实现采访红军的计划。后来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红军与张学良率领的军队达成了休战协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才有了暂时的空闲，得以轻松而从容地接受斯诺的长达数月的采访。而斯诺也从旅行和采访中了解到张学良对延安的秘密访问和谈判，他直接感受到，“剿匪者”与“匪”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已经把蒋介石精心编织的天罗地网撕开了一个大缺口，

悄悄发生的潜在变化，与官方公布的、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已经大大不同。

当斯诺完成4个月的“西行”回到西安，斯诺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他说：“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不过，直接采访到张学良并将少帅的与红军停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发表出去的不是斯诺，而是他的夫人海伦。

按照预约，海伦在1936年10月由北京来到西安，准备在这里迎接从陕北归来的丈夫。在等候斯诺期间，她得以采访到张学良。在这位美国女记者面前，张学良慷慨陈词，通过外国媒体，向全世界透露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和决心。

从孙中山、宋庆龄开始，20世纪的中国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早已形成了一个传统或者说习惯，他们更愿意通过外国记者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之于世。不仅仅限于政治，甚至家庭背景的回忆、私生活的描述等等，也是率先在外国人的笔下出现，然后中国老百姓才一一得知。这显然是那些活跃在中国的，或者一时关注中国的外国人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同行们无疑黯然失色，他们只有在在一旁羡慕而嫉妒。然而也应看到，许多时候只有外国媒体才能不受中国政治的限制，把官方禁止的信息传递出去，在这一点上，外国记者自然有着无法取代的优势。

这一次，海伦再次捕捉到天赐良机，发挥了独有的优势。

在接受海伦的采访时，张学良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

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海伦回忆，她的关于张学良的访问记，在西安被电报局拒绝而无法发出，便于10月5日返回北京，当天就将之发送给各地，伦敦的《每日先驱报》，中国的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华北明星报》等，均先后发表。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了海伦的这一壮举。他摘录的是1936年10月25日《纽约太阳报》上发表的访问记。海伦在文中写道：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言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到他们逼迫的话。

在西安事变之前，海伦的文章是对张学良态度的最早报道。只是，此时无论海伦还是斯诺，乃至张学良、杨虎城本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一两个月后，中国会发生石破天惊的一幕。

三

斯诺、海伦后来可能会有点感到遗憾，因为他们都无缘出现在 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西安现场。

海伦匆匆离开西安，除了电报局拒绝发送张学良访问记的电文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走进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兰德这样说：“海伦曾来到西安想到保安与丈夫会合，但不得已只好返回北平，部分原因还在于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员的劝告，他们警告海伦说她在西安这座城市的出现，会引起对斯诺的注意，现在他也许正在返回途中。他的胶卷、笔访本一旦被国民党发现就会被没收。”

很巧，就在《纽约太阳报》刊发海伦的张学良访问记的同一天，10 月 25 日，斯诺回到了北京。他陶醉于西行探险的成功之中，随即和海伦一起忙于整理采访笔记，开始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率先完成的是《毛泽东访问记》，很快就于 11 月 14 日开始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他成功了！在我看来，对于他个人来说，这远比留在西安等待巨变更为更要。

他们不在西安，恰恰为另外一个外国人提供了机遇。她

便是史沫特莱。

当斯诺正在陕北采访期间，史沫特莱接到1935年曾在她家避难过的中共人士刘鼎的邀请，从上海来到西安。刘鼎此时是张学良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络人。兰德认为：“刘需要一个同情的左翼记者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态发展，这也许就是他为何邀请史沫特莱来西安的原因。”

兰德还这样写道：

史沫特莱想前往红色根据地。尽管她写过一本关于红军及其在福建、江西的战斗的书，但她却从未亲临其境。她想见见红色游击队。正是史沫特莱催促马海德前往红色根据地，史沫特莱还促成了斯诺的探险，当然她没有料到他会在她之前抵达那里。可以猜测，她对此显然颇为失望，是斯诺而不是她，成为红军选上的西方记者。

10月，在西安，史沫特莱见到了从保安归来的斯诺，听他兴奋讲述自己的见闻。她的失落和羡慕可以想见。不过，她的机会也即将来临。

12月12日一天天逼近。

史沫特莱本来住在蒋介石后来下榻的华清池迎宾馆，但在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所有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我在西安仅有的一家新式旅馆西京招待所定一小间房间，打算过些时再回临潼那座寺庙。”史沫特莱这样说。她住到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她将在这里亲历那一夜的风

雨，而对华清池的一切只能事后从传闻中得知。

在史沫特莱之前，另有一位外国女人也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她便是嫁给王炳南、随丈夫来到中国的德国姑娘王安娜。王炳南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父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活动在杨虎城周围。

王安娜在回忆录中对西京招待所略有描述：“朋友们领我们到离车站不远、全市最现代化的西京招待所。在西安，这家由中国旅行社新建的旅馆，就像是坐落在中世纪环境里的20世纪孤岛一样。在陈设华丽的拱顶餐厅里进餐，或在设备齐全的舒适的客房里休息，会使人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欧洲，至少是上海的大旅馆里。这家旅馆从经理到主厨，都是上海人，他们的神情就像是被流放到这里来似的……”

就是这所西安城内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又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驻进，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招待所，但未能得逞。很快，石破天惊的一夜在西安降临。

四

有点儿遗憾的是，当12月12日凌晨在华清池发生捉拿蒋介石的精彩一幕时，并没有一个外国记者目击现场。

倒是有一个外国人无意中出现在现场，他却不幸撞在了

士兵的枪口上，命丧黄泉。他便是史沫特莱的朋友旺斯克大夫（Dr. Wunsch）。据兰德所写，旺斯克是西安的一位德国牙医，是史沫特莱选择的一位向红军提供药品的代表。10月间当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时，史沫特莱便是在旺斯克大夫家中与斯诺见面，听斯诺讲述为之兴奋的探险故事。当时在场的还有刚从上海辗转而来的中国作家丁玲，并由她准备了饭菜。12月12日早上，旺斯克大夫来到临潼华清池迎宾馆看望史沫特莱，他不知道史沫特莱在蒋介石下榻华清池之前已经被迫搬进了城内的西京招待所。当他赶到入口处时，遇到正在执行任务的东北军士兵的盘问，语言无法沟通，而旺斯克大夫却执意走进宾馆，结果他被士兵枪杀。

只有史沫特莱在西京招待所经历了兵变时刻。不过，她亲眼目睹的不是陈诚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被捕的过程，而是同时发生在招待所里的西北军士兵的肆意抢劫。这样，我们从她的回忆录中看到的，只能是对抢劫现场的生动描述，而真正石破天惊的场面，她也只能依据他人的经历来转述。

但是，她的现场经历，虽然是大事件中的小插曲，却仍能从容易被人忽略的另一角度充实历史细节。

尽管与红军有密切联系，尽管对西安日渐出现的抗日情绪和要求国共停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有切身感受，史沫特莱还是对这天凌晨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甚至开始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紧接着，她所在的西京招待所，因为居住着蒋介石的

大批高级随员，自然成了华清池之外的另一中心。

史沫特莱后来对王安娜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招待所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声音、脚步声、叫骂声……”

她听到的声音，显然便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随后，对她的抢劫开始。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几支步枪砸我的房门。我不愿帮助谋杀我的凶手进来，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子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也随即粉碎。

一群士兵闯进她的房间。

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我的梳妆台里翻了出来，把一切引得起他的兴趣的东西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和内衣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赞叹声。

用枪把我抵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过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它扑过去，平分了那里面的钱，一

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一个拿了我的铅笔，各自把战利品别在胸前的口袋上，最后，他们每人从床上拽走一条毛毯，就消失在楼下大厅里了。

不过，抢劫给史沫特莱带来的不快和恼怒，很快就淹没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这样，当 she 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后，她的情绪随之改变。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 停止一切内战。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

她没有半点儿迟疑，很快出现在抢救伤员的现场。对于她，这不过是略显平淡的开始，而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她才真正令整个中国和西方世界刮目相看，并引发种种议论、猜测。

石破天惊的这一刻终于来临。

五

且把镜头转到 12 月 12 日同一天的北京。

当史沫特莱惊魂未定还没有拿到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声明的同时，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特别是记者们，正在为北京这一天可能出现的另一场面而忙碌着——这一天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

斯诺，来自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以及另外几位外国记者，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走上街头。他们对段祺瑞当年执政期间发生的镇压学生的惨案当然有所了解，因此估计段祺瑞出殡时，学生肯定会上街游行，而警察也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举动出自职业需求和职业习惯，而动荡中的中国，时刻都有爆发新闻的可能，这也就总是不断地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学生果然上街了！警察也果然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但是，让这些外国人感到有些意外的，则是北京当局表现出的新的态度。

贝特兰回忆说：

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会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蔼可亲得

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

此时，他们谁又能想到，是这天清晨西安的石破天惊如此迅速地对北京的官方当局产生了影响。

当天夜里，贝特兰知道了西安发生的事变。

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同样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愿意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个26岁的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了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他的西行探险的文章，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

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主要是毛衣和厚内衣，塞进帆布背包。然后匆匆去南城城根下斯诺家，去取一个装得鼓鼓的封了口的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地址。这是埃德加给我准备的，如果我有机会，就把它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人。“把它装在贴身的荷包里，”他教我说，“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的蓝衣社看到这个小玩意。”

如同一个传奇故事。在中国的外国人似乎总是不断地体验着类似的经历，冒险、刺激、兴奋，同时带给他们永远的满足。

火车徐徐离开北京。一切都无法确定。蒋介石命运如何？西安处在什么状况？无法预料。贝特兰不会想到，当他急切地奔向西安时，还有另外的外国人也将以不同身份、经过不同途径前往那里。他们中间就有角色最为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曾先后担任过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

西安，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石破天惊的一刻，正在改变着中国，乃至最终波及世界。

六

从时间上来看，在上海的德国姑娘王安娜（中文名字），比在北京的斯诺和贝特兰，要晚知道西安发生的兵谏。她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是在12月13日读报时才知道这一消息的：

当我看到12月13日星期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西安叛变！蒋介石遭反叛分子逮捕！》时真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里，一路上思潮起伏。西安，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怕啊！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哄哄的议论声。原来我的朋友们也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所惊动，使他们平时星期日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为之一改。我们盯着那则简短的报道看了又看，谈论它的含义及其他，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推测事件的始末。

她不能不为正在西安的丈夫王炳南担忧，他正担任杨虎城的秘书。几天里，王炳南没有消息来，报纸上也只有官方渠道颁布的消息，结果，各种传言弥漫上海和全国。她这样说：“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就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像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可是，在西安事变爆发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正陷入这样的流言之中。

王安娜的这种感受，在身为记者的斯诺身上应该说更为强烈。来到中国已有多年，他对中国官方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毫不陌生。尽管如此，因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对新闻报道的严格控制，仍让他为之吃惊，甚至有一种切肤之痛。斯诺下面

的这番话，描述出当年新闻封锁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状况：

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

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个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了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给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王安娜在上海接触到的传言与斯诺描述的情况相差无几。她每天处在传言此起彼伏的环境中。虽然几天后王炳南拍来电报报平安，但她仍然不能放心王炳南的处境，并且迫切希望投身历史现场。用她的话来说，她认为在西安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在那几天，她在上海的寓所，每天都有中国朋友聚集在一起分析局势。她表示了前往西安的决心。大家都予以反对。前往西安，路途遥远，加之局势不明，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还要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在北京、上海乃至中国各地的人们对西安发生的事情内幕茫然不知的时候，远在英国的拉铁摩尔——后来出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美国学者，同样为中国发生的突变感到震惊，而且自己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该如何对公众解释这一切。哪怕他被人们视为著名汉学家，应该能够说明中国发生的事情。

我在伦敦时，著名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绑架总司令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接到泰晤士报社和当地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社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能不能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了什么事，它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给他们同样的答复：“我到你们办公室来没有用，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多。”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

次同时被当地的主要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和共产党报纸请求“开导”他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的确如拉铁摩尔所讲的那样，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西安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涉及到某一阵营，而且实实在在震动着全世界，它所引发的中国政治格局、权力格局、战争力量格局的变化，势必影响整个世界，这一点自不必多言。

七

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甚至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

他便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时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 1903 年来华，1946 年病逝于上海，一生的事业都在中国展开。从结识孙中山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宣言》，到独家报道日本关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 40 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说在 20 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作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

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能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消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外国人。譬如北伐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曾君临国共两党，被世界舆论视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譬如，曾经一度指挥过红军的德国人李德，其作战思想被认为导致中央苏区的崩溃……但是，在我看来，就个人在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而言，他们仍无法与端纳相比。

斯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他说：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是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

束。

谁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也会很快被打破？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一则是12月16日《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斯诺回忆，张学良在 12 月 19 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 and 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这方面的故事描写已经很多，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止一种。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挖掘出他的资料，找到他的日记、信件，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八

斯诺等外国记者们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

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最先担任西安政府方面电台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莱。在经历了事变当夜的紧张慌乱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帮忙抢救伤员，随后便积极投入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行动的工作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在电台报道西安方面的动态。她回忆说：

这时南京电台在宣传蒋委员长已经遇害身死，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和强奸事件。为了驳斥这种无耻谰言，一位报纸编辑开始以华语广播，而由我负责做英语广播。我的报道内容包括访问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和有关西北近况的消息。

我的言论使南京政府颇为不快，几个月后我听美国报纸几位记者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员甚至曾经宣布他们决定要驱逐我。南京的一位发言人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声称，我的言论具有“强烈支持统一战线以及其他违背政府既定方针的主张”。

在经历了最初两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史沫特莱的行为受到压力，不再适合播音。正在此时，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从北京来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上海赶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电台的德文播音员。与史沫特莱的回忆相比，他们两人对电台现场的描述要生动和详尽得多。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这时候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位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王安娜对电台紧张气氛的描述，可以看作对贝特兰回忆的很好补充：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惟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

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 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贝特兰说，这个电台的外国小组，除英语、德语外，还有俄语、法语广播。可惜不知道担任其他语种播音的是谁。

九

贝特兰、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莱的队伍，应该是在 12 月底之后，因为，他俩都未能目睹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

这一天是 12 月 25 日，距 12 日发生兵变 13 天。在西安事变全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秘而不宣悄悄释放蒋介石，并且张与蒋同机离开，这无疑是当时另外一件并不亚于兵变本身的爆炸性新闻，不仅仅局外人，它甚至令许多身在漩涡中心的人为之震惊。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已经很多，尽管关于其间变化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我仍然有无法理清的疑惑：在这一过程中，端纳到底传递了哪些消息，做了哪些工作；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公开答应的条件之外，到底还向张、杨

之间做出哪些许诺；张、杨和中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不征求中共代表团意见之前，悄悄把蒋送出了西安，并且张亲自陪同……

诸如此类的疑问，当然是个人无法解答的。

这里，我所感兴趣的是释放蒋介石时机场的现场情况。史沫特莱有幸又成了目击者。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史沫特莱的这一描述，可以由 1937 年李天织所写《西安一月》一文印证：

至 24 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则仍守秘，并由杨令由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于 25 日下午 1 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 25 日许，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2 时许，蒋委员长与张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兵士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委员长乃登机凌空脱险。

从语气看，《西安一月》显然站在南京政府立场对事件过程予以叙述。1979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机场现场的描写有所不同，多了蒋介石因恐慌而重申已答应的六项条件的细节：

汽车一进飞机场，他们就看见飞机场上一两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来是等候欢迎在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留难，不让他走，就着急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一同登上飞

机，立即起飞，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跟着起飞，这时已是下午4时了。

申伯纯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属于上层人士，但他当时正在参加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不在现场，因此他所写的这一细节，可能是杨虎城自己的讲述。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

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罝已经变换。



蒋介石突然被悄悄释放，让许多人大失所望。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

当史沫特莱目睹这一历史场面时，贝特兰还正在前往西安的跋涉途中。

次日晨，我们前往拜会当地的县长，这是一个圆滑的官僚式人物，我一见他的面就不喜欢他。

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西安，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委员长和少帅。

“可是等你们到那里时谁也找不到了。你们昨晚没有听到电台广播吗？昨天张学良和蒋介石将军一起飞到洛阳去了。今天委员长将回到南京。”

如果情况属实，西安事变是莫名其妙地、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可是究竟是这样的吗？

当然，说收场还为时过早。因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三个月时间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格局，张学良、杨虎城今后的命运注定被改变。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名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虽然失望，贝特兰后来还是对张学良表示了特别的敬意：

少帅被与世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了一个对谁也没有妨碍的政治犯，以写写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学术性文章来打发日子。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象征性人物——中国被遗忘的人。但是，他对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与革命延绵不断的中国实现统一和独立这个盖过一切的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习惯于指点江山的风格。她认为：

“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他们的面前走来，又走了过去。